


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丛书

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变迁研究

李斌 等著



發^文黎平府東公訊結周前府提審一堂未及定案移
交本府知此案轉轉平畧人狡強未遽差提因遍
訪郡城公正紳耆又派親信前往南堆平畧附五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民族出版社

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丛书

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变迁研究

李斌 等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变迁研究 / 李斌等著. -- 贵阳 :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6.12

(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丛书)

ISBN 978-7-5412-1852-1

I . ①清… II . ①李… III . ①社会变迁—研究—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清代 IV . ① K297.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5377 号

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丛书
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变迁研究
李 斌 等著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贵州出版集团 18 楼
邮 编 550081
印 刷 贵阳精彩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17.75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412-1852-1
定 价 45.00 元

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

“清代清水江中下游苗侗社会变迁研究” (11XZS032)成果

出版前言

清水江是长江水系的重要支流，是沅江的主源之一，发源于贵州省都匀市谷江乡西北，主要流经贵州省都匀、麻江、凯里、黄平、台江、施秉、剑河、锦屏、天柱及湖南省会同、洪江、芷江等县(市)，在湖南省洪江市黔城镇与漉水汇合，以下即为沅江，最后汇入“八百里洞庭”。清水江干流全长约460公里，流域面积1700余平方公里。

清水江一直是黔东南地区和外界沟通的重要通道。明代，中央王朝即从这里采办大批“皇木”。清代中期，这里商贾云集，木材贸易繁盛一时。清水江流域也是苗族、侗族等民族聚居的地区之一，许多民族村寨至今保存着大量自明代中后期起至民国时期形成的关于土地、山林、木材、房屋等方面经济关系的契约，以及借贷、书信、诉讼、告示、账簿、族谱、碑刻等方面的文书。因首先在锦屏县发现，学术界、政界等开始称其为“锦屏文书”；后来清水江流域许多县市亦有大量发现，故而又称其为“清水江文书”。2010年，“锦屏文书”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国内外法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林学等学术界普遍认为“清水江文书”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对其进行收集、整理、研究日甚一日。

在国家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抢救和保护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盛世时代，贵州民族出版社分期分批组织编著和出版“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丛书”。目的是将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清水江文书”原始记录以及关于“清水江文书”学术研究的成果，比较全面系统地呈献给读者，呈献给社会，呈献给未来。

本丛书按“点面”与“纵横”相结合的思路实施著述与出版工作。一是注重典型，对若干典型民族村寨收藏的“清水江文书”原件进行影印、整理、点校、注解。二是突出重点，对“清水江文书”中的林业契约文书、土地契约文书、典当契约文书、借贷文书、诉讼文书、古碑文等进行分类整理和研究。三是拓宽视野，从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民族学、人类学、生态学等

学科，对“清水江文书”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

本丛书的著述与出版，是一项较大的文化工程，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丛书编辑组



序 言

张应强

时近岁尾，李斌兄来电告知他主持的一项国家社科项目研究成果已定稿付梓，邀我作一短文以为书序。因为研究主题关涉的清水江流域，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关注的地区，这不仅使我可以又一次接近斯土斯人，更是学术同好提供的观摩学习的难得机会。对此情谊我倍感珍惜，然为文作序亦心怀忐忑，是以拖延至今。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与李斌兄和他领导的年轻充满活力的学术团队常有接触和交流，他们不仅有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和学术特长，而且富有切磋砥砺和精诚合作的精神，每每感慨欣赏之余，对他们的工作和成果满心期待；加之凯里学院作为该区域唯一高等学府，尽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甚至可以说他们都无需考虑走进历史田野的路径与方案，他们其实就一直在清水江流域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现场。春华秋实，终于有了这本经过数年潜心田野与研究即将刊行面世的《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变迁研究》。

以初步的阅读和粗浅的理解，我首先深切感受到了作者区域整体关照问题意识和研究意趣。在全书的谋篇布局及分析讨论中，涉及生态环境、区域移民、政治结构、经济开发、市场网络、宗族构建、社会治理、教化科举以及民众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是对清代清水江“苗疆”社会历史文化变迁全貌的一个层次分明的综览。由每一个切入点进去，呈现出来的都是清水江地区自清代以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的生动历史图景；既有站在雷公山顶对区域一览无余的宏观把握，又有山间溪旁苗寨侗乡精致个案研究的微观视角。这样的学术努力与实践的意义，远不止由零星探讨转而系统研究的简单肯定所能涵指，其更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于再次践行甚或重新思考和演绎了区域研究之要义。在过往关于清水江流域民族文化、木材贸易、宗族组织、民间习惯法、苗民起义等个案研究中，孤立的地方中心研究取向

的印记时有所见，甚至自觉不自觉囿于或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地方史窠臼。本书则将所关注的清水江这个区域与“人”、与人的活动乃至人们的观念联系起来，去探索清代以来汉文化与苗侗民族文化接触与交融的历史过程，展现了一个开放的、有广泛多样外部联系的“苗疆”区域社会演变。

同时，特别值得在此一提并应予以充分肯定的，是本书对碑刻、族谱、契约文书等民间文献资料所进行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研究。地方民间文献的广泛采用，除一般意义是“补史之阙、纠史之偏、正史之讹”作用之外，置身于清代清水江流域苗侗文化的历史场景中，这些遗存至今的汉文文献丰富了中国地方民间文献形式和内涵；基于民族文化背景，在结合其他地方文献和口述资料基础上对这些珍贵民间文献进行释读，或可对独具特色的“民间历史文献学”理论和方法大有裨益。

此外，这种基于田野调查和文献解读的宏观整体审视和系统梳理，在全面展现清水江社会变迁图景的过程中，也大量触及和描述了区域内丰富多彩的富含民族特色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独特的历史资源，对于今天促进民族文化繁荣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具体重大的现实意义。可以说，这既是本书作者作为高等院校人文社会学科研究者，坚守学术本分、秉承历史使命，服务地方、推动社会健康稳定发展所尽的一份责任，更折射出他们顺应时代需求，对斯土斯民关切中绵延深厚的人文情怀。

以上点滴感言，聊以为序。

2016年12月15日于中山大学马丁堂

（张应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课题缘起	(3)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5)
第三节 基本思路与分析框架	(13)
第一章 清水江流域自然生态资源与移民	(17)
第一节 自然生态环境	(19)
第二节 移民与人口结构变化	(22)
第二章 从“化外”到“王化”：清水江流域政治结构化过程	(31)
第一节 由“一元”向“二元”管理体制的过渡：渐变中的苗疆社会	(33)
第二节 “改土归流”：王朝统治的制度化过程	(41)
第三章 “木材贸易”：清水江流域经济结构变迁	(49)
第一节 交通拓展与河道疏浚	(51)
第二节 集市形成与贸易扩大	(56)
第三节 “皇木”采购与贩运：区域社会的经济结构重组	(60)
第四节 “三帮”“五勳”和“山客”：经济利益驱使下的人群聚合	(75)
第四章 宗族社会的建构：清水江中下游地区社会组织变迁	(83)
第一节 宗祠的修建与发展	(85)
第二节 族谱：王朝典章制度与英雄祖先的结合	(102)

第三节	“王化”渗透与地方精英推动——天柱地坳彭氏士绅宗族的建构	(115)
第四节	王朝体系的地方化再现——锦屏亮司龙氏土司宗族的建构	(124)
第五章	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秩序与社会管理	(133)
第一节	乡村社会秩序及其管理	(135)
第二节	宗族社会管理及其规范：以天柱地区为例	(152)
第三节	乡村社会里的农业管理	(163)
第六章	儒学与教化：清水江流域教育变迁	(177)
第一节	儒学与科举：地方社会里的官学教育	(179)
第二节	黎平府的书院教育	(192)
第三节	从《创建蔚文书院官绅士民捐输碑》看柳霁县的书院教育	(200)
第四节	土司宗族兴学活动：以锦屏亮司龙氏土司为中心	(208)
第五节	村落社会的兴学活动：以地坳村为例	(216)
第七章	清水江流域民众日常生活变迁	(223)
第一节	婚俗变迁：从“转娘头”到“庚帖为凭”	(226)
第二节	民间信仰与日常生活	(235)
第三节	汉神信仰的传播及其影响——以天柱苗族侗族地区为中心	(248)
参考文献		(259)
后记		(276)



绪
论



第一节 课题缘起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浓郁,底蕴深厚,是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最为丰富、保存最为完好的地区,有人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侗族大歌”,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3项72个保护点,在全国市州中名列第一;由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7部委分三批公布的国家级传统村落,共2555个,贵州省占426个,其中黔东南有276个,占贵州省的65%,占全国的10.8%,在全国市州中名列第一。这两项数据足以说明黔东南民族文化资源之富集。黔东南以“原始的自然生态、原生的民族文化、原貌的历史遗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返璞归真、回归自然”自然保护圈之一,被世界乡土文化保护基金列为全球十八大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圈之一。笔者长期在黔东南生活,时常在清水江畔“行走”,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和风俗习惯,对清水江流域的历史文化进行研究有天时地利之便,更有浓厚之兴趣。

虽然黔东南民族文化非常浓郁,但汉文化的特征同样十分突出,清水江中下游地区自清代以来宗族组织较为发达,族谱众多,祠堂林立,具有悠久的历史。汉文化是如何渗透到少数民族地区?如何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对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影响有多大?这些一直是笔者思考的问题。清水江流域社会变迁,其影响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社会秩序、教育、民众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是我们了解地方基层社会、完整认识传统中国的关键。因此,社会变迁越来越被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的学者所关注。

本课题对于清水江流域、黔东南、贵州乃至西南民族地区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首先,本课题选择清水江流域作为研究对象,并以大量翔实的碑刻、族谱、清水江文书等第一手民间文献资料以及档案、地方志等地方文献材料来分析国家与地方社会、土司与土绅阶层、军屯与民众等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运用地方性文献来解读清水江区域社会史的尝试,也试图以此填补国内对清水江流域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不足。

其次,清水江流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其中苗族、侗族是两大主体民族。据2007年统计,黔东南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81.87%,其中,苗族188.08万人,侗族142.36万人。^①苗族占全国苗族人口的18%,侗族占全国

^①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1985~2010)》,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页。

侗族人口的41%^①,是全国苗族侗族最主要的聚居区,有全国最大的苗寨和侗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很少有少数民族人口的详细统计资料,据张肖梅《贵州经济》一书的统计,在民国26年(1937年)时,整个贵州省少数民族比例最高的是今天黔东南地区,“汉民占全县人口数最少之百分率,为下江县(治今从江县下江镇)”,仅占该县总户数之7.69%,其次为丹江县(今雷山县)占10.48%,台拱县(今台江县)占11.51%;该地区台拱的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8.59%,八寨(今丹寨县)占76.75%,丹江占91.15%,黎平的侗、苗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永从占80%以上。^②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有关县(市)志统计,^③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人口占绝大多数,且呈上升趋势。如:在天柱县的四次人口统计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均超过96%,其中侗族人口均超过65%,苗族在30%左右,如1990年侗族就占67.11%,苗族占30.9%。1990年锦屏县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4.84%,其中侗族、苗族人口分别占全县总人口的48.44%、36.09%。1990年剑河县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2.13%,其中苗族、侗族人口分别占全县总人口的56.13%、33.92%。1984年黎平县侗族、苗族人口分别占全县总人口的60.09%、13.49%,到2005年黎平县侗族、苗族人口分别占全县总人口的66.5%、15.4%。1990年三穗县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0.59%,其中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41.2%,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30.77%。1990年凯里市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3.57%,其中苗族、侗族人口分别占全市总人口的62.82%、3.39%。1987年雷山县苗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82.6%。1990年台江县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5.46%。1990年麻江县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4.45%,其中苗族人口分别占全县总人口的28.85%。1990年丹寨县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5.34%,其中苗族人口分别占全县总人口的74.99%。从上述统计中可知,在清水江流域总人口中苗族侗族占绝大多数。因此,对这样一个民族区域进行细致的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是大有裨益的。

①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概况》,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② 张肖梅:《贵州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版,第9页,第13~16页统计。第9页和第13~16页之间的数据略有出入,但并不影响我们对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的判断。

③ 贵州省天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天柱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123页。贵州省锦屏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锦屏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贵州省剑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剑河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页。贵州省黎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黎平县志》,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92页;贵州省黎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黎平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57页。三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三穗县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97、112页。贵州省凯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凯里市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贵州省雷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雷山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贵州省台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台江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贵州省麻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麻江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丹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丹寨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页。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国内外有关明清以来清水江流域“苗疆”的研究,起始甚早,但早期多集中于民族学领域,例如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①和吴泽霖等主编的《贵州苗夷社会研究》^②即是。不过,除了大量的民族学研究成果之外,有关历史学领域的研究,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也积累了不少成果,近两年出版了几本相关研究论文集,如张新民主编《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吴平、龙泽江主编《清水江流域文化研究》,王宗勋主编《锦屏文书研究论文集》。^③ 归结起来,清水江流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辟苗疆与“改土归流”研究

清朝开辟苗疆与“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原因、目的、措施、影响、历史地位等,代表性的论文有:张捷夫《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李世瑜《试论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和目的》、林建曾《清朝前期完善贵州省建置、开辟苗疆及其影响》、罗康隆《苗疆六厅初探》、王纓《鄂尔泰与西南的改土归流》、余宏模《清代雍正时期对贵州苗疆的开辟》、周相卿《清代黔东南新辟苗疆六厅地区的法律控制》、方铁《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策略与效用》、马国君《论雍正朝开辟黔东南苗疆政策的演变》、庞思纯《方显与“开辟苗疆”》、《鄂尔泰改土归流的善后措施》等。^④ 这些成果显示,学者们都

① 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 吴泽霖等主编:《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③ 《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14年版;吴平、龙泽江则将在《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自从2009年创刊以来发表的相关论文集,出版《清水江流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王宗勋将与清水江文书(锦屏文书)相关论文集,出版《锦屏文书研究论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版。

④ 张捷夫:《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载《清史论丛》第2辑,1980年。李世瑜:《试论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和目的》,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林建曾:《清朝前期完善贵州省建置、开辟苗疆及其影响》,载《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罗康隆:《苗疆六厅初探》,载《贵州文史丛刊》1989年第1期。王纓:《鄂尔泰与西南的改土归流》,载《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余宏模:《清代雍正时期对贵州苗疆的开辟》,载《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周相卿:《清代黔东南新辟苗疆六厅地区的法律控制》,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6期。方铁:《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策略与效用》,载《河北学刊》2012年第3期。马国君:《论雍正朝开辟黔东南苗疆政策的演变》,载《清史研究》2007年第4期。庞思纯:《方显与“开辟苗疆”》,载《贵州文史丛刊》2007年第4期。刘本军:《鄂尔泰改土归流的善后措施》,载《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是在肯定“改土归流”、开辟苗疆积极作用的前提下,对清王朝的血腥杀戮给予批判,并把“改土归流”后苗疆人口增长作为其进步的表现。然而,这种观点似乎值得进一步讨论,因为清政府尚未征服苗疆之时,人口统计的数字极不全面,许多“生界”“苗寨”人口根本没有统计,人口大规模增长的史料数据也未能确定,何炳棣就曾指出西南少数民族均不列入保甲户口登记的史实。^① 张中奎《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迁》^②一书颇有新意,其贡献有二:一是为既有的西南研究提供了“苗疆再造”的新案例,二是进一步突出在帝国格局中审视地方族群的整体史观,并把清王朝“再造苗疆”简化为“生苗→熟苗→民人”和“新疆→旧疆→腹地”彼此关联的双层模式。赵世瑜《清水江文书在重建中国历史叙述上的意义》则提供了另一个思路,清水江流域是否是“由于商品化、市场以及这里的人们因应这一情势而做出的生计模式的改变”,才导致国家的改土归流?^③

二、苗民起义研究

清雍正乾隆年间苗民起义、咸丰同治年间苗民起义爆发的原因、口号、性质、斗争经验、人物评价、作用等,相关论著有胡思庸《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的苗族大起义》、马少侨《清代苗民起义》、陈元煦《张秀眉领导的贵州苗族农民起义(1855~1872)》、王锺翰《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始末》、张永国《试论清代雍乾年间黔东南苗族的反抗斗争》、杨正文《雍乾苗族起义的几个问题》、赵宏章《贵州咸同大起义与贵州地方团练势力的形成》、孙秋云《文明传播视野下的雍乾、乾嘉苗民起义》等。^④ 这些研究由于受时代背景和研究范式的影响,集中围绕引发苗民起义的原因是“阶级矛盾”还是“民族矛盾”等进行论述,显然已陈旧窠臼。

① 何炳棣,葛剑雄译:《明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0页。

② 张中奎:《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③ 赵世瑜:《清水江文书在重建中国历史叙述上的意义》,载《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5年第4期。

④ 杨正文:《雍乾苗族起义的几个问题》,载《苗族史文集——纪念乾嘉起义一百九十年》,湖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胡思庸:《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的苗族大起义》,载《史学月刊》1954年第8~9期。马少侨:《清代苗民起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陈元煦:《张秀眉领导的贵州苗族农民起义(1855~1872)》,载《历史教学》1965年第2期。王锺翰:《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始末》,载《文史》第10辑,1980年。张永国:《试论清代雍乾年间黔东南苗族的反抗斗争》,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赵宏章:《贵州咸同大起义与贵州地方团练势力的形成》,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孙秋云:《文明传播视野下的雍乾、乾嘉苗民起义》,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三、风俗习惯与“百苗图”研究

苗人的风俗习惯与“百苗图”研究等,代表性的论文有:陈国钧《苗族的放蛊》、邝充《说“蛮烟瘴雨”》^①、刘峰《“鬼蛊”的想象与建构——对黔东南苗族聚居区的考察》^②等文章,从文献角度追溯了苗蛊的渊源、性质、原因,并认为苗疆巫蛊是“客民”对苗民形象妖魔化的一种建构。吴通才《黔东南施洞地区苗族的婚姻》、潘定智《从黔东南苗族婚姻歌看古代苗族婚姻》、孙秋云《黔东南地区苗族“还娘头”婚俗剖析》、王宗勋《侗族“舅公礼”与婚姻制度的变革》、李斌和吴才茂《从转娘头到庚帖为凭:清代清水江流域苗侗民族的婚俗变迁》等文章,讨论了黔东南地区苗族侗族的婚姻习俗、婚俗变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③“百苗图”是源于清嘉庆初年八寨理苗同知陈浩所著《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是清代流官用图画对苗民的一种特殊文化记载和表述。黄才贵《“黔苗图说”与民族识别》、李德龙《清代贵州“百苗图”研究》^④等文章,对产生于清代各种版本的“百苗图”,从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音乐学等角度进行了研究。杨庭硕、潘盛之《百苗图抄本汇编》^⑤一书,汇集了各种版本的“百苗图”,为学界从事相关研究提供了范本,便于利用。

四、清水江文书及其研究

近年来,在清水江流域发现了大量的契约文书、族谱、碑刻等民间历史文献,这些新史料的发现,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形成了几个比较突出的研究领域。

其一,民族民间习惯法。利用清水江文书研究民族习惯法和少数民族法制史,显然是目前最为引人瞩目的领域之一。徐晓光通过撷取清水江流域所谓“清江四案”及其他纠纷案件,勾勒出了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清水江流域林业运行的法制机制,并逐步

① 均载吴泽霖、陈国钧编:《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刘峰:《“鬼蛊”的想象与建构——对黔东南苗族聚居区的考察》,载《思想战线》2007年第5期。

③ 吴通才:《黔东南施洞地区苗族的婚姻》,载《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2期。潘定智:《从黔东南苗族婚姻歌看古代苗族婚姻》,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孙秋云:《黔东南地区苗族“还娘头”婚俗剖析》,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王宗勋:《侗族“舅公礼”与婚姻制度的变革》,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李斌、吴才茂:《从转娘头到庚帖为凭:清代清水江流域苗侗民族的婚俗变迁》,载《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

④ 黄才贵:《“黔苗图说”与民族识别》,载《贵州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李德龙:《清代贵州“百苗图”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⑤ 杨庭硕、潘盛之:《百苗图抄本汇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